

## 也斯 《煩惱娃娃的旅程》的記憶與跨文化經驗

黃 渝 然\*

### <目次>

- |                 |                  |
|-----------------|------------------|
| I. 緒論           | 2. 被殖民者的話語權主張    |
| II. 以他者觀自我的記憶表述 | III. 跨文化交流的困境與超越 |
| 1. 從交流記憶到文化記憶   | IV. 結論           |

### I. 緒論

香港獨特的文化面貌源於其歷史淵源。自鴉片戰爭後成為英國殖民地，香港便成為介於中國與西方之間的貿易口岸與政治緩衝帶。殖民統治引入現代法治、教育制度與資本主義經濟，為香港奠定現代都市基礎，同時也造成本地居民在身份與歸屬上的混亂。隨著二戰後冷戰格局形成、大陸的政治動蕩，躲避戰亂的大量移民湧入，使得香港本地的民眾基礎長期以華人社群為主體，文化認同與中國社會一直維繫深厚連結。中西文化的長期並置致使香港文化兼具難以用單一文化視角來看待的混雜與多元性。特別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後，隨著城市化進程加速與經濟起飛，香港人的關注重心逐漸轉向城市本身，帶來對本地經驗的再發現。彼時受中英會談、回歸議題等影響，在前途未明的憂慮下香港人開始思考自身的位置，這種歷史性懸置也使香港由此時期起逐步發展出一種地方性認同。香港人對身份的追問聚焦在城市本身，藝術家、知識份子等對以各自的方式造色城市生活經驗，於是七、八十

\* 동국대학교 중어중문학과 박사과정 수료

年代的香港文藝界順應著懷舊的潮流也開始在主體性上有所突破。流行音樂、電視、電影等大眾媒體與視覺文化都逐步形成本地風格，有識之人藉由創作本身反思香港的處境。

港英政府和中國政府從不同立場出發記述香港歷史，也同樣催生身處於中西文化夾縫之中的香港人的本土意識，他們在文化混沌中更渴望書寫香港人自己的歷史。歷經一百多年殖民統治的香港在缺少“去殖民化”的過渡下走向回歸，覆蓋過渡期的八十年代恰好處於殖民體制向本土自覺的轉折點，當然香港文學也在此轉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香港年輕人的成長一直伴隨着香港記憶，戰後成長的香港作家不再揹負着上一代沉重的鄉愁和鬱結，他們嘗試通過作品傳達的主題意識撇除外界對香港文學只有通俗一面的固有偏見。地理隔斷，時日推移，當上一代新香港移民的大陸記憶只成回憶，此前香港文學以大陸鄉愁與移民經歷為主的主張，現實主義書寫逐漸轉向對城市空間、生活節奏與個體內在感受的探詢<sup>1)</sup>，可以說進入本土意識興起的七十年代後，香港文學的本土性更多表現為借作品中人物之口說出香港是我們的城市和故鄉的主張。因此，不少作品通過留存集體記憶與紀錄城市生活感受<sup>2)</sup>，希望香港可以從被外部界定的空間轉變成為可以被重新想像的文化場。

香港長期陷於政治和文化的‘失語’處境令香港人身份認同變得極為曖昧，而不斷找尋身份的過程又是構建身份認同的重要組成，“他者”與“自我”的辯證是身份認同的核心，那如何通過觀看他者(Other)來確立自我(Self)?也斯<sup>3)</sup>

---

1) 此處是對七十年代後香港文學在整體偏向上的一个概論，並不意味著所有作家都遵循此路向，也並未指以七十年代為分界，之前和之後文壇分別只存在南來文人和本土作家創作，南來文人和本土作家作品中的主題意識也不是一成不變。例如葉靈鳳、劉以鬯和陶然分別在不同時期南下香港，其作品在到港時期有較明顯的對香港的疏離感，但從後期作品的主題轉向已經反映了對香港的融入感。並且綜觀香港文學史，為香港方物立誌、著書、辦刊等，他們都不同程度地為香港文化與文學作出顯著貢獻。

2) 例如西西的《我城》和《飛氈》，董啟章的《地圖集》、鍾曉陽的《喚真真》都不同程度涉及到香港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暴動、水災等對集體記憶的喚起。

3) 也斯(梁秉鈞, 1949~2013), 出生於廣東, 兒時隨父母移居香港。也斯的文學生涯橫跨半個世紀, 作為多產作家, 創作體裁多樣而備受讚譽, 被認為是香港代表

捕捉到這點，在徘徊於他市的過程中，以客觀視角觀察日常瑣事、衣食住行、人際交往、異質文化之間的衝突，激發對“我城”深層次的反觀。其《形象香港》、《蔬菜的政治》和《後殖民食物與愛情》和《煩惱娃娃的旅程》等後殖民文學作品就從不同面向探討了後殖民處境下探求他者與自我間的過程和香港文化自身的混雜面貌。

小說《煩惱娃娃的旅程》(又名《記憶的城市 虛構的城市》)<sup>4</sup>講述了“我”前往異國探訪老朋友，通過對不同國家風土人情的觀光與友人的相處，記錄了與不同人之間的相遇與文化碰撞。雖其在題材上被歸類為小說，但敘述技巧上揉合了散文、遊記、抒情等方式。小說〈後記〉處，也斯提及他發覺“寫實的手法、單線的敘事，幫助不了我說要說的話，所以結果也無可避免地拂逆了一些規矩”<sup>5</sup>，因此他“越過了界線.....嘗試打破文類的限制，好似從遊記開始，卻夾雜了散文和評論，也有虛構的小說、變奏的頌詩”<sup>6</sup>，明確“小說裏有我的感情也有我的想法”<sup>7</sup>。因此，全篇沒有明顯的故事線，情節也缺乏

作家之一。在香港長大的也斯對香港有着深厚和獨特的感情，輾轉各國的經歷中他接觸了多元文化，積累了跨文化交流經驗，並試圖以接納和融合多元文化的態度去反觀和記錄香港。也斯長期活躍於香港文壇，其作品曾被翻譯成英文、日文、德文等語言出版。作為“戰後嬰兒潮”後的一代，其反映香港多元文化背景的文學創作成為理解香港後殖民處境與城市精神的重要文本。也斯作品在韓國的翻譯本現況包括單行本《포스트식민 음식과 사랑》(예쓰 지음, 《포스트식민 음식과 사랑》, 김혜준·송주란 옮김, 지식올만드는지식, 2012.); 部分詩、散文、短篇小說可參照 ① 리비화 외, 《월미각의 만두》, 김태성·김순진 옮김, 푸른사상, 2012. ② 베이다오 외, 《눈부시게 새빨간 부겐빌레아》, 박재우·김윤진 옮김, 푸른사상, 2012. ③ 천메 외, 《빅토리아 항을 지나며》, 박남용·김순진·박재우 옮김, 푸른사상, 2012.) 本文研究對象目前還未見韓文版。

- 4) 《煩惱娃娃的旅程》在1983年也斯由美國返港時寫成。文稿一直到90年代初才整理出版，以原本名字《記憶的城市 虛構的城市》出版。並將章節增至10章，可視為《煩惱娃娃的旅程》的增訂本。本文因包含對“煩惱娃娃”這一意象的探討，而將研究文本選定為《煩惱娃娃的旅程》(1996)，較1996年版本，《煩惱娃娃的旅程》(2016)多增加長版〈後記〉以及插圖，特此說明。
- 5) 也斯, 《煩惱娃娃的旅程》，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6，〈後記〉參照。
- 6) 同上。
- 7) 同上。這裡引用也斯的話想說明兩點。第一，也斯自身對於此小說的體裁也並非十分明確。第二，雖說小說中的“我”與也斯本人難以完全等同，但通過也斯的此

跌宕起伏，對於人物性格的刻畫也不十分清晰，以一般小說側重矛盾的設立不同，此小說更著重展示作者的內心世界，包含了受到不同文化衝擊時的隨想、對文化記憶以及後殖民的諸多思考，“可視為也斯多年從事香港研究及創作的總回顧”<sup>8)</sup>。

學界對《煩惱娃娃的旅程》(或《記憶的城市 虛構的城市》)的討論包括王璞曾指出小說運用後現代式的敘事方式處理真實與虛構，將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張力視為理解文本的重要關鍵，也提供了閱讀香港城市書寫與身份問題的基礎視角<sup>9)</sup>；林麗英認為小說的敘事者在異地旅行時，不斷回看自己在香港的成長經驗與受教育背景，臨近九七的歷史情境使小說人物對文化身份格外敏感，他們的迷惘與不安亦與當時香港社會普遍的政治焦慮的交纏相關<sup>10)</sup>；王德威認為此以旅行為核心，透過在異地的漫遊與“不在場”的視角，反襯出香港本身難以直述的狀態，但也斯的城市書寫在語氣上既深情又節制，巴特式的反覆華人遲疑呈現出他對香港複雜而細膩的情感關係<sup>11)</sup>；劉靖之從形式的角度切入，認為此作品非傳統小說，散文風格更為強烈，讚揚了也斯的文學新嘗試<sup>12)</sup>。韓國學者如金惠俊、朴南用與宋珠蘭在討論也斯的其它作品時對該小說雖有所提及，因涉及面過窄較難看作是對單一作品的先行研究<sup>13)</sup>。

---

番說話，可以佐證小說人物與作者本身有一定的同構性，並且在小說展開的過程中，也涉及到也斯的某些親身體驗，包括他如何在黃竹坑的鄉下家庭長大，從小如何與父母從大陸帶來的舊書為伴，成大後的個人的興趣發展，以及在〈回程〉中詳談了與兒子的相處。所以“我”的觀看與思考某程度上也夾含也斯自身的感情與想法，以“我”的記憶與體驗來探討也斯的價值觀，有其合理性。

- 8) 王德威, 〈香港——座城市的故事(節選)〉, 《也斯作品評論集》, 陳素怡編, 香港: 文學評論出版社, 2011, 324頁。
- 9) 王璞, 〈小說中的傳統與現代: 談也斯的小說〈記憶的都市 虛構的都市〉〉, 《現代中文文學評論》第3期, 1995, 91-98頁。
- 10) 林麗英, 《也斯作品中之歷史、記憶與文化身份》, 臺灣: 國立交通大學外國文學與語言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民國九十七年。
- 11) 王德威, 《香港——座城市的故事, 如何現代, 怎樣文學? 十九、二十世紀中文小說新論, 二版》, 臺北: 麥田, 2008, 279-305頁。
- 12) 劉靖之, 〈一本不是小說的小說——《記憶的都市·虛構的都市》讀後〉, 《也斯作品評論集》, 陳素怡編, 香港, 文學評論出版社, 2011, 327-330頁。

現有討論對敘事者在他地與他者的往來中，“記憶”如何被轉化並承擔文化意義的層面著墨較少，基於此，本文試圖透過分析“我”在他地與他人的交往如何表現從交流記憶在文本中逐步轉化為文化記憶，看到也斯在關於身份、歷史、文化存續與話語權的主張和第三世界被殖民者在邊緣中的表述以及爭取話語權的努力，並試圖藉此思考當今更廣泛的跨文化交流中受狹隘視角夾困以致產生偏見的社會議題。

## II. 以他者觀自我的記憶表述

### 1. 從交流記憶到文化記憶

“記憶”是該小說的一大主題。阿斯曼(Jan Assmann)的文化記憶理論在發展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集體記憶理論的基礎上將集體記憶劃分為交流記憶和文化記憶<sup>14)</sup>，交流記憶指通過日常接觸和交流建立起來的記憶。

- 13) 例如金惠俊在分析《後殖民食物與愛情》時，認為《記憶的城市 虛構的城市》中說「我們這時代，……也見到記憶被壓抑，被歪曲，也見到人們向記憶探索，想尋找真相。……一個人可以面對他的記憶，他才是一個成熟的人；一個國家能面對它的記憶，才可以是更成熟而開放的。」(頁84)可以看也斯有意在為了尋找、保存、製造這些記憶－歷史而努力，可以說這些努力的一部分就是《後殖民食物與愛情》(김혜준, 〈예쓰(也斯) 소설 《포스트식민 음식과 사랑(後殖民食物與愛情)》의 홍콩상상과 방식〉, 《中國語文論叢》 제75집, 2016)參照；林南用和宋珠蘭分別在其文章對也斯的創作介紹中提及有此代表作(박남용, 〈예쓰(也斯)의 문학 속에 나타난 홍콩의 지리공간과 도시문화 연구〉, 《세계문화비교연구》 제65집, 2018. 송주란, 〈헤테로토피아로서의 홍콩 : 也斯의 後殖民食物與愛情과 陶然的 陶然中短篇小說選 연구〉, 부산대학교 박사학위논문, 2017)參照。
- 14) 哈布瓦赫曾在《記憶的社會框架》中指出，「記憶」深受社會因素制約，並非純粹的生理概念，由此將“集體記憶”這一概念引入了社會心理學領域。並強調個體記憶只有通過與集體的互動才能形成和回憶，集體記憶也必須依附於具體的事件或人物並獲得集體的意義認同。哈布瓦赫的研究為記憶研究帶來社會學轉向，但未延展至文化層面。阿斯曼 在1997年出版的著作《文化記憶》中發展了哈貝瓦赫的觀點提出了“文化記憶”的概念並將“記憶”引入到了文化學的研究領域。揚·阿斯曼

阿斯曼認為記憶最基本的功能是存儲功能，人作為記憶的載體，單獨的個體記憶不可能完整、全面、準確地反映歷史，個體記憶也要借助於多種的他人記憶才能完成，因此他特別區分了交際記憶與文化記憶。前者以個體的親身經歷為核心，通過口述、日常交流等非正式的方式傳遞，通常具有時間上的有限性，而後者則超越個體生命，通過符號、儀式、文本、影像等穩定的文化媒介被保存和再生產。

小說中，“我”通過記錄與社會小人物的相處、謀求對話進行記憶。<sup>15)</sup>“我”在異鄉不斷遭受刺激，從而不斷回想到過往“我”與友人們的經歷，在與黃先生、S、W等個體相處的過程中，探討了包容、秩序、標準、偏見與公平、傳統與現代的文化對立、開放等一系列異文化的隔閡。通過與不同的個體交流，喚醒他們的過往記憶，並將這些分散的、個體性的記憶相互補充、拼合，透過文字系統完成“交流記憶”向“文化記憶”過渡。

在紐約，“我”與W交流在香港搞戲劇的境況。W在香港的藝術實踐不僅沒有得到認可反被詬病，大眾的誤解磨滅了他的創作激情，他來到紐約開始新生活且不願再提起在香港做戲劇的相關。“我”在回憶這段往事時，憐惜他在香港無法繼續他的藝術生涯，“我”理解為何是這樣的風氣，因為“我”作為文字工作者也對這種保守封閉的創作環境感同身受。同時透過在紐約觀看演出，“我”回憶起提倡用粵語翻譯布萊希特詩作的經歷。“我”注意到語言對本地化戲劇轉播的局限性，希望能將口語化粵語搬上舞臺，建立本地化戲劇，隨之也憶起與一些語文老師談文藝的過往，指出他們輕視粵語、“純粹中文”的偏見，“我”與W的交談展現出個體記憶如何反映香港文化氣候，喚醒“我”在

---

認為文化記憶是“通過對自身歷史的回憶、對起著鞏固根基作用的回憶形象的現時化，群體確認自身的身份認同。這不是一種日常性的東西，從一定意義上講，它有‘超越生活之大’，超越了尋常，成為典禮、非日常社會交往涉及的對象”。參照揚·阿斯曼，《文化記憶：早期高級文化中的文字、回憶和政治身份》，金壽福·黃曉晨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47頁。

15) 對於這樣做的目的，也斯袒露“九七將近，許多人想寫大時代、戲劇性的傳奇，我沒有這樣的野心，我只是想從一些比較熟悉的普通人物身上，看他們如何承受挫折、化解煩惱，在傾側的時代自己探索標準、在混亂裏凝聚某些素質。”也斯，《煩惱娃娃的旅程》，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6，〈後記〉參照。

封閉創作環境下的感受以及對成對香港文藝的認知。透過反思這些局限，“我”將交流經驗提升到對本土文化保存與語言傳播問題的文化理解。在巴黎，我曾與S對話。S是位畫家，受文革牽連從大陸出來後並未在香港呆過太長時間便來到法國，但第一次見面他便向我們發問“香港已經玩完了，你們回去做什麼？”<sup>16)</sup>作為香港人的“我”與S對話時，遭受其對香港的誤解與輕視。S的封閉與偏激刺激“我”思考偏見、公平以及跨文化對話的可能性，並將那些被封鎖的個體經驗從交流記憶中提取出來，通過文本的力量納入文化記憶中，推動集體對歷史文化創傷的直面與反思。另外，透過回憶與黃先生在茶餐廳的閒談這類日常層面的交流，引出了“大鹹濕”(廣東話中有好色之意)等低俗文化對城市人文滲透的思考。黃先生自嘲式地談笑香港低俗文學的盛行，認為“要瞭解香港文化就不能不去看《大鹹濕》”<sup>17)</sup>，黃先生的閑言使得《大鹹濕》作為一種瞬間性的笑談變成具有反思價值的文化指代，留存下香港文藝的通俗面貌。當這些日常交流中的零散記憶被作者書寫時，它便超越了個人交談的層次，轉化為一種文化記憶。

阿斯曼認為“文化記憶是不言自明的，而是需要細緻引導的”<sup>18)</sup>，文化記憶在內容上指向了在歷史發展中具有奠基性意義和鞏固根基性意義的歷史事件，文字系統則將非共時記憶不斷拉入當下的社會框架之中，確保了記憶的歷時性延續。難得的是也斯通過文本留存的記憶還引導了香港記憶的保存路向，小說中的“記憶”橫跨了從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近半個世紀。譬如“她的一家突然離開了香港”<sup>19)</sup>影射了五十年代的移民潮；反天星小輪加價的靜坐和“土制鳳梨”的社會背景分別是1966年的“九龍騷動”和1967年的“六七暴動”；“有人在獄中突然去世”<sup>20)</sup>則是大陸政治鬥爭的隱喻。此外，像對文化大革

16) 也斯, 《煩惱娃娃的旅程》, 桂林: 漓江出版社, 1996, 106頁。

17) 也斯, 《煩惱娃娃的旅程》, 160頁。

18) 揚·阿斯曼, 《文化記憶: 早期高級文化中的文字、回憶和政治身份》, 金壽福·黃曉晨 譯, 49頁。

19) 也斯, 《煩惱娃娃的旅程》, 31頁。

20) 也斯, 《煩惱娃娃的旅程》, 31頁。

命、《中英聯合聲明》簽訂前對談無限期地延期、學生運動、恒生指數下跌和九龍城寨遷拆等的提及也直觀地重現了當時的社會記憶。談及文字與記憶，阿斯曼認為文字系統“除了提供某些實際的功能外，還為文化意義的外部存儲從根本上提供了可能，這意味著社會記憶的結構發生了一次深刻的轉變”<sup>21)</sup>，文字使得文化經驗、歷史與價值觀可以不依賴於個人記憶而得以跨世代傳遞。也斯出生在四十年代末，彼時處於童年時期的也斯對於五十年代的歷史事件雖感受不深，卻通過文字以間接或直接的方式再現歷史，幫助時代銘記歷史，因為這些歷史與香港記憶無法割離。一如紀錄下W的記憶，“她記憶中的香港有古老的銅壺、磨芝麻糊的沙盆、可以躲藏在裏面的盛米的麻布袋、潮州蒸鵝和白蘭花的香氣、寬大的父親和慈愛的白髮母親，一些就這樣走在香港街頭根本不敢相信仍然存在的人和事”<sup>22)</sup>，現時的香港已經不再有這些痕跡了，可見也斯對“記憶”抱持惋惜的態度，他認為城市無法脫離記憶而存在，但談及香港對保存記憶的不盡人意，也斯不免是悲觀的。

“若果我在這兒大叫：‘(香港)真是一個失憶的城市！’W卻無動於衷，他表示已經對這城市死了心，再也不會生氣了……但我仍想記下細節，希望有一日能令失憶的人重新記憶”。<sup>23)</sup>

“在中國大陸，文革以後，不少作者，寫作回憶的文字。目前的問題，是如何回顧過去。不少被壓抑的記憶，再度公開。許多過去不可以提的名字再次提起，許多過去不可以出版的作品，再出版了。有時研究者發現，一些老作者不願意重印某些作品、重提某些人物，有些模糊的範圍，仍沒有整理出來。要等到這些禁忌都消除，我們才會有更完整的文學史。要等到一個人可以面對他的記憶，他才是一個成熟的人。一個國家能面對它的記憶，才可以是更成熟而開放的。”<sup>24)</sup>

21) 阿萊達·阿斯曼·揚·阿斯曼 著，〈昨日重現——媒介與社會記憶〉，《文化記憶理論讀本》，馮亞琳·阿斯特莉特·埃爾 主編，陳玲玲 譯，丁佳寧 校，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26頁。

22) 也斯，〈煩惱娃娃的旅程〉，16頁。

23) 也斯，〈煩惱娃娃的旅程〉，26頁。

24) 也斯，〈煩惱娃娃的旅程〉，62頁。

在一個連歷史記憶也難以保存的城市，尋找自我身份和文化認同將是一場艱難的旅程，但也斯的體悟並非在做蒼白的自我貶低，反而體現了對集體遺忘的反思，更強調了記憶面對壓抑、禁忌與創傷時的困境與必要性。而與普通人的對話過程將零散的個人記憶整合成具有公共意義的記憶，不僅豐富了社會整體對過去的理解，也讓那些原本易於消逝的私人經驗獲得了被長久保存的可能。換句話說，個體的記憶通過交流與共享，逐漸形成具有集體認同和歷史維度的文化記憶，這種記憶能夠超越個體經驗的時間局限，進入社會的記憶框架中，成為建構身份、延續文化記憶的重要資源。只有當一個社會能夠正視“禁忌”與創傷，文化記憶才能得到重構與延展。也斯在此的寫作意圖，正是通過記憶來抵抗失憶，讓那些被時間、政治或意識形態壓制的個體經驗重新進入文化記憶。當也斯選擇不依附於既定記憶體系時，他便藉由“話語權”來主張自身的位置。

## 2. 被殖民者的話語權主張

“文化記憶是一種機制，它被外化、對象化並以符號形式儲存”<sup>25)</sup>，可知阿斯曼認為記憶也是借助符號才得以再現和表述。文化記憶借助的媒介多樣，如文字、圖畫、塑像、紀念物、象徵物、建築物、節日、儀式、機構都可作為“記憶場”(Sites of Memory, 皮埃爾·諾拉語)。“煩惱娃娃”作為也斯創造的文化意象、符號和象徵物，同樣承載著文化記憶的功能。“煩惱娃娃登場了，從曖昧的位置，瀕於失落與被遺忘的邊緣”<sup>26)</sup>，煩惱娃娃的登場即富有隱喻的意味。因為佩服瓜地馬拉族的煩惱娃娃出身於內戰與貧困交織之地仍能常保明朗笑容與客觀心態，帶有鮮明顏色，“我”與同行一行人第一印象就爱上了在柏克萊孕育成長的煩惱娃娃。“我”一直將煩惱娃娃帶在身邊，時常對

25) Jan Assmann, “Communicative and cultural memory”, Astrid Erll and Ansgar Nünning(eds). *Cultural Memory Studies : An Internation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Handbook*, Berlin and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2008, p.110.

26) 也斯, 《煩惱娃娃的旅程》, 9頁。

她傾訴煩惱，與娃娃的相處呈現出一種尋求對話的方式。“我”之所以熱衷與娃娃對話，在於“我”覺得自身擁有與娃娃一樣的顏色，也可稱之為“第三世界”的顏色。在娃娃面前我才可以了無忌憚實現平等對話，與煩惱娃娃的傾訴表達在社會主流輿論制約中難以直接吐露的心聲。從煩惱娃娃的自身類比自身被殖民者的出身，在娃娃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我”從不敢發聲到“我心安理得。我來自第三世界”<sup>27)</sup>，張揚不卑不亢的品性。人偶本來不具備生命，在小說裏卻成為了“我”最佳的旅遊伴侶與傾聽者。“我”與煩惱娃娃借助旅行穿梭於各個城市之中，以旁觀者的姿態有距離感地觀察異文化。同時人偶也是被操控的、無自主性的，這種“被擺佈”恰可以象徵在殖民夾縫中失語的“我”與“我們”。所以被賦予情感、身份與歷史煩惱娃娃既是情感的寄託體，也是殖民記憶的轉喻。

“製造我們的，是一個複雜的地方。不是在高度文明的西方科技世界。我們身上，仍然留著手工藝的粗糙痕跡。她的裙子脫了線，他的臂上有一個線頭，而每人背上，有一片白色的硬東西。我想那是一個沉重的包袱，背著走遍天涯。我們情緒化，感情用事，我們處理事情拖泥帶水，不能斬釘截鐵，把一切拋棄。……我們游離在外面，看到許多事物，但回來又啞口無言。”<sup>28)</sup>

被殖民是一種創傷，香港人在長達一個多世紀的殖民歷史中始終處於話語權的邊緣，導致強烈的表達焦慮與身份漂移感。“我”帶著三盒十八個瓜地馬拉的煩惱娃娃踏上旅程，贈送給在外國謀生的W、Y、D三位友人，也希望煩惱娃娃能幫助他們排憂解難。究竟“我們”有什麼煩惱？源於“我”向煩惱娃娃吐露的，因邊緣身份造成的無話語權。

殖民地生活文化的混雜，令香港在西方科技衝擊帶來的進步外，一方面保留著中國文化的傳統，但同時也蒙受著不中不西的質疑。所以“我”認為“出身複雜”，並且在這種處境中“殖民”成為“沉重的包袱”。“我”在國外面對他人

27) 也斯，〈煩惱娃娃的旅程〉，42頁。

28) 也斯，〈煩惱娃娃的旅程〉，12頁。

的輕視，不願爭辯到底，直言這是自身性格中帶有“某種虛弱”。面對S對香港的誤解，“我”深感“我們這幾個香港人坐在那裏，覺得“香港”又一次變成方便別人使用的東西，感到有點啼笑皆非。”<sup>29)</sup>此外，“我”的朋友在九七前想移民外國，其實這只是個人選擇，無對錯可言，但他卻不敢堂堂正正提起。“這種總是無法自我感覺良好地站在正義一邊發言、總是自信不足、總是無法把自己解釋清楚的態度，又會不會與我們在香港成長的背景有關呢？”<sup>30)</sup>周遊列國，殖民地出身的人在不斷的文化碰撞中也嘗試說一些自己的故事，但聯繫邊緣身份的處境，又不知以何種立場來主張，“我們的身份不明，無可歸屬。我們走入不同的房間，總都找不到安頓”<sup>31)</sup>，爭辯無用，常常落得“啞口無言”，“我”與我的朋友們共同的煩惱是來自殖民地的‘我們’，不論是身處異國，還是來自被殖民的第三世界，都令“我們”處於夾縫的曖昧位置，不懂得也不敢為自己發聲，淪為“他者”，盡顯被殖民者的煩惱。

在後殖民語境下，薩義德(Edward Said)認為西方通過構建對東方他者的刻板印象，為的就是以此來獲得在東方的話語權，“它是一種西方用來控制和君臨東方的殖民方式，本質是帝國主義控制民主的意識形態工具”<sup>32)</sup>。在巴黎觀展時，談及身在異鄉又恥於承認的高爾基和煩惱娃娃族中的藝術家，“我”肯定了某些藝術家的身份矛盾給予他們創作的靈感。究竟被殖民的身份也會令表達一併變得羞恥嗎？與煩惱娃娃的對話中，“我”強調“不是否定我們的出身，是正視它”<sup>33)</sup>，通過類比藝術家的成功，以一種肯定的態度正視了自己的出身。於是到了〈知識〉一章，U登場了，“我”以驕傲的口吻介紹U，“謙虛、開朗、進取、思考世界的問題，他是來自香港的”<sup>34)</sup>。在S之後，這種對照，證明每個個體都可以堂堂正正地擁有話語權。小說結尾，“我”對身份從屬的

29) 也斯, 《煩惱娃娃的旅程》, 111頁。

30) 也斯, 《煩惱娃娃的旅程》, 113頁。

31) 也斯, 《煩惱娃娃的旅程》, 32頁。

32) 愛德華·薩義德, 《東方學》, 王宇根 譯, 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0, 3頁。

33) 也斯, 《煩惱娃娃的旅程》, 66頁。

34) 也斯, 《煩惱娃娃的旅程》, 120頁。

困境更是變得不再隱晦，“作為香港人自小養成的對護照問題、對出入境問題的過度敏感罷了。我們也曾一起舉步，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抗議不公平的事，為我們相信的事發言？”<sup>35</sup>說明雖然歷史塑造了我們的謹慎，但通過列舉曾為香港做的努力，傳達出“我們”並不是完全消極或被動的，“我們”都曾經團結並努力地爭取權益。更深一層看，身份的複雜、歷史的傷痕、社會的壓抑確實存在，但都不應該成為否定自我價值的理由。即使在被邊緣化環境中成長，“我們”依然擁有主體性與尊嚴；“我們”來自殖民地的出身反而可能孕育出對公平、語言、文化與身份更敏銳的意識，成為一種溫柔卻堅定的文化表達自信。

### III. 跨文化交流的困境與超越

小說講述的是“我”遊歷異國的經歷，即“記憶”通過在異地的跨文化交流所觸發，也可以說正是由於跨文化的刺激，“我”得以察覺“我”與“我們”承襲的文化記憶。據薩默瓦(Larry Samovar)及波特(Richard Porter)對跨文化交流(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定義，“跨文化交流指的是擁有不同文化感知和符號系統的人們之間進行的交流，他們的這些不同足以改變交流的事件。”<sup>36</sup>前章所及，文化記憶是“文化媒介被保存和再生產”，那必然不可避免受到人為選擇性地詮釋與取捨，那些被強調、被抹去、被重述或被篩選的記憶，往往也反映了詮釋主體對待跨文化交流的態度。繼而影響到在跨文化交流過程中根據尊重、包容、接納抑或抗拒、貶抑、排外等看待“他者”態度的不同，“自身”觀照的有所偏移。小說中人與人之間的相處展現了跨文化交流間的衝突與融合，涉及到的是如何看待異國形象的問題。

---

35) 也斯, 《煩惱娃娃的旅程》, 190頁。

36) 拉里·A·薩默瓦, 理查德·E·波特 著, 《跨文化傳播》, 閔惠泉·王緯·徐培喜 譯,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4, 47頁。

按照巴柔(Henri Pageaux)的界定,“異國形象”是“在文學化,同時也是社會化的過程中得到的對異國的認識的總和”<sup>37)</sup>,並且“一切形象都源於‘自我’與‘他者’,本土與‘異域’關係的自覺意識之中,即使這種意識是十分微弱的”<sup>38)</sup>。巴柔還指出‘他者’與‘自我’的關係形態可以有狂熱、憎惡和親善三種基本態度。狂熱是指“一個作家或團體把異國現實看作絕對優於注視者文化、優於本土文化的東西。這種優越性使被注視的異國文化形態全部或部分地表現出來。它所引起的後果就是作家或團體把本土文化看成是低級的。與提高異國身價相對應的,就是對本土文化的否定和貶抑,有了“狂熱”的態度,對異國的描述更多地就屬於一種“幻象”,而非形象。”<sup>39)</sup>憎惡則被看作狂熱態度的反面,“與優越的本土文化相比,異國現實被視為是落後的”<sup>40)</sup>,‘親善’是“異國現實被看成、被認為是正面的,它納入了注視者文化,而後者也被視為是正面的,且是對被注視者文化的補充。“親善”是唯一能真正實現雙向交流的態度……親善靠的則是互相瞭解和承認,批評交流和平等對話。”<sup>41)</sup>可知“自我”對“他者”所持的基本態度會影響他們如何解讀“他者”形象。

“狂熱”帶有妄自菲薄之嫌,對他者的不理智追捧,“憎惡”以敵意或蔑視的眼光看待他者,便往往將其描繪為愚昧落後的存在,甚至醜化其形象,使其成為對自身文化的潛在威脅。同時也使本土文化在對比中被自我抬高,呈現出一種自以為優越的位置。“親善”則強調與他者構成一種平等親和的關係。

“我”一直想與他人進行真誠的對話,與S溝通時卻失敗了,“我”發現他只顧自我輸出,自說自話,將個人困境一味歸咎於時代的控訴,在對話過程

37) 孟華,《比較文學形象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154頁。

38) 孟華,《比較文學形象學》,155頁。

39) 達尼埃爾·亨利巴柔,〈比較文學意義上的形象學〉,孟華譯,《中國比較文學》第4期,1998。

40) 達尼埃爾·亨利巴柔,〈比較文學意義上的形象學〉,孟華譯,《中國比較文學》第4期,1998。

41) 達尼埃爾·亨利巴柔,〈比較文學意義上的形象學〉,孟華譯,《中國比較文學》第4期,1998。

中，S始終處於一種封閉的狀態中，當一個人無意理解他者、只把對方的意見當作自身立場的反襯時，便容易以敵意或貶抑的眼光看待對方，S在跨文化經驗中選擇用“憎惡”建構他者，其目的只有一個，即以自己的話語優勢和話語霸權來否定對方，這種強勢的姿態會澆熄對方繼續對話的欲望，使溝通變得困難。相反，面對S對香港各種充滿誤解的發言與輕視，對自身過去的否定，“我”規避了直面還擊的態度，覺得不應該因為對政治看法的不同就全盤否定一個人，選擇以“親善”的態度試圖在S的立場去理解他的偏激，認為這是S無法在跨文化中清楚自身定位帶來的思想脫序。與S形成對比，“我”也記錄下了跨文化交流得以平等對話的積極面。譬如與香港出身、長期生活在法國的Y談論文，談對“詩意”範圍的理解，爭論西方理論在套用於中國文學的適用性時，即便過程中展現了極為兩極的看法，Y也一直維持“親善”的姿態，“她比較成熟，也有心去瞭解人家的政治，社會和文化。”<sup>42)</sup>平等的交流能讓雙方看清自身盲點，在與Y的有效溝通中，“我”也得以感悟同在香港長大的我們對同一事物的解讀都有如此大的分歧，為何不能以客觀與包容接受中西方文化間的更大差異呢？

巴柔同時指出“我注視他者，而他者形象同時也傳遞給了‘我’這個注視者、言說者、書寫者的某種形象”<sup>43)</sup>，強調一種“自我”與“他者”的相互影響關係。與煩惱娃娃同行的一程，其實“我”在注視他者的過程中受到影響。譬如從一開始遺憾Y沒能在香港繼續他的戲劇事業，到換個視角認同他的奉獻精神可以令世界的另一處多份善心。“我”也反觀以往與其他文人的隔空論戰，反思對兒子的教育，這都展現了自我與他者，自我前後不斷謀求跨文化交流的第三種可能性的動態過程。

形象同時也“是對一個文化現實的描述，通過這種描述，製造了（或贊同，宣傳）這個形象的個體或群體”<sup>44)</sup>。與S的見面當然不算愉悅，由S“我”聯繫在外的國人群體發出了感慨。

42) 也斯，《煩惱娃娃的旅程》，104頁。

43) 童慶炳，《文學理論要略》，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157頁。

44) 孟華，《比較文學形象學》，156頁。

“很可惜，在外國的中國人也往往分隔成許多圈子，彼此無法溝通。說到政治和藝術，立即就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好像因為大家的記憶中過去那段時空中的大的傷害和激憤，令彼此現在無法交談。但不能面對過去，也就沒有現在呀。當每個人退縮回一個習慣的框格裏，也不能與不同圈子的人交換意見了。

我走入這個陌生的圈子，本來是想去瞭解不同背景的人，以為可以互相對話。走入別的圈子，走入別的媒介，就像旅行去一個新的地方，旅程令我們觀看各種新的事物，回頭來反省自己，但是過分嚴密的防衛，會令人無從交談”<sup>45)</sup>。

作為同族<sup>46)</sup>，“我”指出像S這類持“憎惡”態度的同胞在面對異文化時價值觀中的狹隘性，恰恰表現出一種文化自覺，因為在全球化語境下，一個民族的文化形象不僅通過政治與經濟，也通過個體在跨文化交流中的表現來顯影。因此，直面並反思我們在接觸異文化時的不當態度，不僅是對他者的尊重，也是自我認知的提升。

然而“親善”畢竟是一種理想要求，在現實跨文化交流中，因既定歷史記憶、文化背景與權力影響，“親善”往往會受到偏見的干擾。奧爾波特(Gordon Allport)在《偏見的本質》(The Nature of Prejudice)中將“偏見”界定為一種“基於錯誤和頑固的概括而形成的憎惡感”<sup>47)</sup>，並指出基於偏見帶來的預先判斷來引導我們的注意和記憶，繼續產生歧視和人身攻擊，可見“偏見”在跨文化交流中的破壞力。但殖民地中的人和殖民帶來的文化斷裂往往還要同時遭受宗主國與母國的偏見，這使被殖民者看待“偏見”時養成更敏銳的視角和更包容的心態。

“我們這一代的許多朋友，在殖民地長大，但也嘗試不自卑亦不自傲地去

45) 也斯，《煩惱娃娃的旅程》，108-109頁。

46) “我”稱S是同族是為了區分像煩惱娃娃的不同族，更深一層說也可以看作是也斯在異文化中想探討不同民族間平等對話的可能性的巧思。

47) 戴維·邁爾斯 著，《社會心理學》，侯玉波，樂國安，張智勇 譯，北京：人民郵電出版社，2015，304頁。

認識其他文化。也不是沒有心理錯綜，也不是沒有遭受歧視，但在外面生活，亦願意在接觸中消除先入為主的誤解，真正面對偏見。”<sup>48)</sup>

殖民的處境使“香港”受到英國的權力壓制，無論是英國人佔據所有政府部門的要職還是只針對華人的種族歧視<sup>49)</sup>，同時中國大陸國族敘事傳統又以被殖化的標準俯視香港，質疑其成份混雜，“香港”本身落入“不中不西”的偏見之中。這種“夾縫”處境和跨文化背景帶給香港文學文化獨特的生態面貌<sup>50)</sup>，也因此催生了香港作家急於反駁外界偏見以及表達自我的本土認同，小說中對殖民時代東西觀照的思考就反映出作者試圖消解絕對化的可能。

“東與西的相遇，並不是在均等的勢力、和諧的氛圍之下，而是充滿誤解與矛盾的。這是一個存在已久的事實，近日再成為話題。對“東方熱”的討論、

48) 也斯，《煩惱娃娃的旅程》，208頁。

49) 例如規定華人不許涉足歐式風格的社區、建築場所、私人酒店、高級會所；禁止華人在山頂一帶洋人住宅區日常交往或留宿；對華人夜間活動和參與公眾集會的限制令。

50) 更全面觀來看待香港文學的話，可以大致由兩種方式接近。一是從歷史和政治的縱向切入。一方面香港曾長期作為英國殖民地和戰爭的避難所，也是中華民族受難歷史的記憶空間。另一方面，在冷戰時期，香港處在大陸和臺灣之間中間成為意識形態相對自由的空間，也正是這種特殊性令在這個場域中孕育出的文化和文學有其獨特與多元性，最特別的是左翼和右翼文學可以在此處共存。同時得益於此處的相對自由開放和秉持不同意識形態知識份子的聚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香港也成為銜續中國五四新文學、上海新感覺派文學以及發展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前沿地。二是從地區獨立性看待作為全球大都會的香港的橫向接近。工業革命後，西歐、美國等地大都市拔地而起，應運而生的是追求成功機會和生活便利或為了躲避戰亂而尋找避難所的大量移民，可以說香港的華麗是像巴黎、紐約一樣，由移民者而創造。因此香港文學置於全球化的框架下看待其文化形態在華文圈也具有代表性。可以說香港的特殊性在於其長期處於多重權力與文化交會的邊緣，這種夾縫性構成了香港文化的多元、混雜，也正是在這個場域中孕育出香港文學的多語言、言文分途、雅俗並存、聚焦都市、在本地經驗與中西文化之間、在殖民與國族之間來回等的特質。因此也帶給香港作家思考第三種視角的契機。但第二點常被研究者忽略，只以中國文學的宏大意識作為基礎評價香港文學是庸俗的，所以才會出現像香港文學只是中國文學的附庸這種片面的斷論。這同時也可以看作是像也斯一樣的本土作家致力為香港文化和文學發聲的目的之一。

民族主義的討論，都有實在的需要。只怕感情洋溢的辯論，演變成一種簡單的排他態度、一種過分簡化他人而自我肯定的態度，那就沒有反思的餘地了。”<sup>51)</sup>

“但若以為美國只等於荷裏活的殺戮電影，或西方人只是自私而沒有家庭倫理沒有道德的，那就未免太簡化他人、自我感覺過分好了。”<sup>52)</sup>

在“自我”與“他者”的觀照中，小說流露出避免對西方固定化的去本質思維。那借助小說也斯想表露何種跨文化交流觀？

也斯在曾出版的詩集《東西》中提及了不同於對東方只作為被西方造像一方的看法：

“我們今天很難再只是簡化地說西方打量東方、用陳腔濫調把對方歪曲定型；東方同樣也在用既定的目光端詳西方，用自己的偏見為對方造像呢！我們只能在種種偏執的夾縫裏，感到荒謬之餘也試找一些空間，試去發見其他種種可能的看法與關係。”<sup>53)</sup>

可見，也斯認為東方也會以自身的偏見與想像西方，這個觀點的見解性在於他試圖質疑了後殖民理論中西方凝視東方的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拒絕把東方或西方任意一方固化，他更擔心的是情緒化的民族主義會演變成排他性，阻礙平等的跨文化交流。換言之，也斯的跨文化觀體現一種拒絕絕對二分化，倡導包容與多元化，不斷在交往中尋求第三種可能性的靈活。<sup>54)</sup>

51) 也斯, 《煩惱娃娃的旅程》, 205頁。

52) 也斯, 《煩惱娃娃的旅程》, 208頁。

53) 梁秉鈞, 〈食物、城市、文化——〈東西〉後記〉, 《東西》, 香港: 牛津大學出版社, 2000, 171頁。

54) 也斯曾吐露《煩惱娃娃的旅程》歷經長期間才得以出版的原因包括在創作期間他自身的想法也在不斷地改變, “以前確信的, 在現實變化中受到考驗”, 所以他不斷重寫再重寫。就算是重返巴黎時也會有糟心的經歷, 一改往日的好印象。這其實也顯示了也斯不執著於某項標準答案, 在接收到新的刺激時, 樂於接受改變的態度, 維持第三種可能的視角看待。(《煩惱娃娃的旅程》, 杭州: 浙江大學出版

聯繫現今，我們不禁思考，在跨文化交流中的難以溝通只是曾遭遇創傷（例如被殖民、被政治運動牽連等）個體或群體面臨的問題嗎？在文化創傷之外，由小說推及現實生活，我們會發現S式人物指代完全可拓展到身在國外卻無法客觀審視跨文化、缺乏世界觀的形象。前往國外旅行或生活，不願看到也不願承認他者的長處，以淺薄的認識將個人意志強加他者，忽略當地人的真實體驗與感受，強調自身認知才是唯一且正確標準的行為仍不斷發酵。由此藉也斯的跨文化觀，筆者想對當今隨處可見的“避雷”言論提出一些思考。

不否認如今大數據時代，社交媒體的發展極大地拓寬了人們獲取信息與分享經驗的渠道，大眾可以更便捷地獲取關於世界各地的第一手資料。尤其在旅遊領域，網路分享推動了信息公開，提醒他人規避消費陷阱、不合理安排或文化誤解。同時，不同背景、不同視角的用戶在社交平臺上發表對同一地點或事件的感受，也豐富了大眾看待世界的方式。其中，始於2020年前後，“避雷”逐漸成為個體在對待異文化時持否定態度的表達。部分“避雷”帖或許可以幫助他人在出行前預判潛在風險，避免時間和金錢上的浪費，幫助高效出行。但當“避雷”成為一種流行話語甚至泛化行為時，也應引起我們的注意。據筆者觀察，很多時候“避雷”帖往往只基於個體經驗和主觀判斷，很可能因期待落差、文化差異、心理預設等因素而偏頗，一些人面對不同國家的生活方式時，沒有試圖理解當地為何如此運作，而是急於用自身既定的標準去衡量他人，甚至對當地的秩序與制度、當地人固有的生活習慣加以否定，理由僅是以個人基準的“我不喜歡”或“我們國家不是這樣的”。更有甚者，將自己的偏見包裝成忠告，對他人生活習慣、風俗信仰指手劃腳，這種傲慢的態度是對他者的無視，忽視了旅行本應包含的對他者文化的理解過程，進而可能傳播對目的地的片面印象甚至污名化。在跨文化交往中，這類將自身經驗視為普遍真理、並以居高臨下的姿態評判他者生活方式的心態，本質上也是

---

社，2016，〈後記〉參照）。此外，也斯這種拒絕二分化的觀點在其其它作品也時有顯露，例如在小說《剪紙》(1974)中，通過設立東西方兩個全然不同背景的主人公的異常精神狀態暗喻中西文化完全對立的失質；又如在《後殖民食物與愛情》(2003)中，通過食物的混雜與來指代不同文化背景之間人的相處矛盾。

一種文化中心主義的表現。尤其當我們未能深入理解當地歷史語境、社會結構與民眾生活經驗時，只基於表面觀察的判斷都易於滑向誤讀與偏見，陷入狹隘的認知中，這不僅無助於建構真正的文化理解，還削弱了作為觀看者應具備的敏感性與尊重意識。更具體來說，這種出國後仍堅持以本國語境中的經驗去評判他國的做法，實際上也忽視了文化差異背後的複雜現實。像S一樣，對外部世界缺乏尊重與傾聽，只會讓自身的認知停留在膚淺的表象上，既無法真正理解所處的環境，也容易陷入誤解與文化隔閡之中。參照S，縱使時代的動盪和社會的不公會影響個人的命運，讓某些悲劇難以避免，但如果只是一味指責時代，把時代當作掩蓋自身問題的藉口，不反省自己在過程中的選擇和責任，也會失去成長和改變的可能。跳出自以為是的框架，承認他者的合理性與多樣性，才意味著我們開始突破單一價值體系的局限。在狂熱、憎惡、親善這三類注視中選擇“親善”，邁向一種更包容、更複雜的世界認知，也斯的跨文化觀至今仍未過時。唯有在正視創傷的基礎上，開放對話、共用記憶、消滅偏見、尋找多元詮釋的路徑，跨文化交流才能真正走向深層的互信與共生。

#### IV. 結論

香港文化為香港文學創作創造語境與提供素材，香港文學則將香港文化的混雜多方位詮釋，二者在相互作用中成為了香港在地作家建構香港認同的基本肌理。在現代後殖民語境下，也斯將異國的遊蕩經歷作為思考不同文化之間交匯的支點，通過與本土文化拉開距離，從個人經驗出發，探討跨文化交流的可能性，積極留存文化記憶，反映身處殖民夾縫中的香港人在中西文化衝突中的掙扎與反思，向世界揭示在殖民創傷中面對的矛盾與焦慮，並藉此主張第三世界被殖民者的話語權，希望由此來破除外界對香港的誤讀與偏見。面對殖民身份、香港文化的異質性以及異文化，他更在作品中展現出理

解、尊重、包容、多元的拒絕二分化的跨文化觀，完成對跨文化交流經驗的超越。距小說成書已過近半個世紀，社會在迅速發展，但跨文化交流中受狹隘視角夾困以致產生偏見並不會消失，甚至會滋生像“避雷”這樣新的文化亂象。若現代人只以自我標準判斷他者，漠視差異，只會使跨文化交流更易被誤解甚至走向相互敵視。也斯在其小說《煩惱娃娃的旅程》所展現的跨文化觀不僅適用於對後殖民的反思，更觸及當下全球化社會所面臨的共同困境。換言之，跨文化交流的困境或許不在於文化本身的距離，而在於我們是否願意尊重彼此的不同，可見也斯的跨文化觀對當今仍有適用意義。

### 〈參考文獻〉

- 김혜준, 〈예쓰(也斯) 소설 《포스트식민 음식과 사랑(後殖民食物與愛情)》의 홍콩상상과 방식〉, 《中國語文論叢》 제75집, 2016.
- 박남용, 〈예쓰(也斯)의 문학 속에 나타난 홍콩의 지리공간과 도시문화 연구〉, 《세계문학비교연구》 제65집, 2018.
- 송주란, 《헤테로토피아로서의 홍콩 : 也斯의 後殖民食物與愛情과 陶然의 陶然中短篇小說選 연구》, 부산대학교 박사학위논문, 2017.
- 예쓰 지음, 《포스트식민 음식과 사랑》, 김혜준·송주란 옮김, 지식울만 드는지식, 2012.
- 리비화 외, 《월미각의 만두》, 김태성·김순진 옮김, 푸른사상, 2012.
- 베이다오 외, 《눈부시게 새빨간 부겐빌레아》, 박재우·김윤진 옮김, 푸른사상, 2012.
- 천메 외, 《빅토리아 항을 지나며》, 박남용·김순진·박재우 옮김, 푸른사상, 2012.
- 陳素怡 編, 《也斯作品評論集》, 香港: 文學評論出版社, 2011.
- 孟華, 《比較文學形象學》,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1.

- 童慶炳, 《文學理論要略》, 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98.
- 也斯, 《煩惱娃娃的旅程》, 桂林: 漓江出版社, 1996.
- \_\_\_\_\_, 《煩惱娃娃的旅程》, 杭州: 浙江大學出版社, 2016.
- \_\_\_\_\_, 《剪紙》, 杭州: 浙江大學出版社, 2014.
- \_\_\_\_\_, 《後殖民食物與愛情》, 香港: 牛津大學出版社, 2009.
- \_\_\_\_\_, 《記憶的城市 虛構的城市》, 香港: 牛津大學出版社, 1993.
- 梁秉鈞, 《東西》, 香港: 牛津大學出版社, 2000.
- 王璞, 〈小說中的傳統與現代: 談也斯的小說〈記憶的都市虛構的都市〉〉, 《現代中文文學評論》 第3期, 1995.
- 林麗英, 《也斯作品中之歷史、記憶與文化身份》, 臺灣: 國立交通大學外國文學與語言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民國九十七年.
- 拉里·A·薩默瓦, 理查德·E·波特 著, 《跨文化傳播》, 閔惠泉·王緯·徐培喜 譯,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4.
- 戴維·邁爾斯 著, 《社會心理學》, 侯玉波, 樂國安, 張智勇 譯, 北京: 人民郵電出版社, 2015.
- 王德威, 《香港——座城市的故事, 如何現代, 怎樣文學? 十九、二十世紀中文小說新論. 二版》, 臺北: 麥田, 2008.
- 達尼埃爾·亨利巴柔, 〈比較文學意義上的形象學〉, 孟華 譯, 《中國比較文學》 第4期, 1998.
- 揚·阿斯曼, 《文化記憶: 早期高級文化中的文字、回憶和政治身份》, 金壽福·黃曉晨 譯,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5.
- 馮亞琳·阿斯特莉特·埃爾 主編, 《文化記憶理論讀本》, 陳玲玲 譯, 丁佳寧 校,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2.
- 愛德華·薩義德, 《東方學》, 王宇根 譯, 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0.
- Astrid Erll and Ansgar Ninning(eds). *Cultural Memory Studies: An Internation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Handbook*, Berlin and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2008.

###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Yesi's *Cities of Memory, Cities of Fabrication* to better understand how Hong Kong memory and identity are expressed in literary writing. The study addresses the difficulties of intercultural interactions, in which conflict and integration affect perceptions of identity in a hybrid society. A major emphasis is placed on the transition from “communicative memory” to “cultural memory”, which reorganizes and gives collective recall new meaning in cross-cultural contexts. Furthermore, Yesi's literature negotiates the position of the colonized by addressing issues of voice and representation connected with the “Third World”, redefining identity within a postcolonial context. When taken together, these characteristics show how memory, culture, and identity connect in Yesi's work, providing vital insight into Hong Kong literature and its broader cultural implications. As an author raised within a postcolonial framework, Yesi actively engages with Western urban cultural paradigms. Through the analytical lens of the Other, he articulates Hong Kong's identity as a peripheral metropolis with a distinctive perspective. This sustained process of cultural observation enables Yesi to critically examine Hong Kong's liminal geopolitical status. His narrative oeuvre embodies a reflexive consciousness of marginality, not rooted in uncritical admiration of Western paradigms, but rather in an effort to preserve collective memory and individual subjectivity through engagement with the Other.

Key Words : Hong Kong literature(香港文學), Yesi(也斯), Cities of Memory, Cities of Fabrication(煩惱娃娃的旅程), cultural memory(文化記憶), cross-cultural(跨文化)

